



聚焦减税降费

怎么减? 谁受益? 咋落实?

编者按 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已打响第一枪——1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减税降费为寒冬注入了一股暖流,已成为2019年最值得期待的政策。2019年为何要大规模减税降费? 减税降费怎么减、如何降? 谁是受益者? 在落实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本期《新闻洞察》为“减税降费”出谋划策。

■ 怎么减

减税要着眼当前, 兼顾长远

■ 本报记者 王丽娟

刚刚过去的2018年可以说是减税大年,年初确定的全年减税降费1.1万亿元的目标,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下半年又陆续出台了多项增量政策,财政部预计全年减负能达到1.3万亿元。

对于这些超预期的减税红包,市场的反馈也较为积极,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多家企业都表示享受到了减税红利,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他们表示减免之后的税收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同时,较多小微企业也反映税收较以往大为减少,整体在向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面转变。

减税基本方向仍延续去年

从市场反馈可以看出,2018年的减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我国税制改革还处在不断推进的阶段,为企业谋取减税红利仍然任务艰巨。因此,当时间进入2019年,减税力度不仅没有告一段落,而是随着新一年的开始又开启了新篇章。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这两次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确定了市场对于减税的预期,但具体怎么减,如何减,市场上众说纷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俊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九月份前后,企业普遍反映经营压力加大,再加上财政收入维持较快增长,全社会掀起了一轮关于减税的热烈讨论。这轮讨论基本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减税的基本方向。

张俊伟认为,今后减税的主要着力点应该在四个方面。一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逐

步消除制造业和服务业税负不公的问题。二是落实个税改革新规,减轻居民个税负担。三是针对小微企业普惠式减税。根据企业规模或盈利水平,普遍实行阶梯式的所得税政策;企业规模越小,政府救助力度越大。四是针对特定问题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如减免汽车购置税,以提振汽车销售;减免印花税以提振股市信心等。

对于2019年减税空间有多大,市场上也有一些预测,综合看来预估在1.5万亿元左右的声音较多。张俊伟则认为减税空间的大小要考虑全社会的承受能力。如果我们更多采用阶段性减税措施的话,减税空间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主要采取永久性减税措施,那么减税空间就会相对小一些。

用足用活“临时性”减税政策

减税是把双刃剑,给企业带来实惠的同时也意味着财政收入的下降,如何平衡这两方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张俊伟认为,“大规模减税”是决策层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也是企业和社会舆论的普遍呼声。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也出现了下降的局面。

他认为,财政收入的下降则使减税面临复杂的局面。而且随着经济运行进入周期下行阶段,财政赤字的攀升难以避免。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推进“大规模减税”,必然会引发全社会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的普遍担忧。因此,2019年的“大规模减税”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操作上的艺术性。

在他看来,大规模减税既要着眼眼前,也要兼顾长远。所谓着眼眼前,就是减轻企业负担,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所谓兼顾长远,则指减税要能同深化现代财政改革、完善税收体系有机结合起来。

他表示,当前,我国税制仍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比如说,汽车保有购买环节税收重(车辆

购置税10%),而持有环节则明显偏轻(车船税);再比如制造业增值税率为16%,明显高于服务业的10%,税负明显不公。

因此,2019年应该将减税的效用最大化,他认为要以减税为杠杆,撬动税制制度改革,加快税制重构的步伐,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用足用活“临时性”减税政策。比如,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同时,提高车船税税率到国际平均水平;同时规定提高车船税税率的措施三年后生效,用两到三年时间把车船税税率提高到目标水平。这样,一方面减免了车辆购置税,刺激了汽车消费;另一方面,随着三年后车船税税率的提高,实现了车船税对车辆购置税的替代。再比如,对企业所得税实行为期三年的临时性减免,以真正体现税收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特点;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维护《企业所得税》的法律尊严。

中小企业依规模梯度减税

在高层提出“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受市场关注较多的小微企业能享受到多大的红利呢? 答案在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揭晓,此次会议明确提出再次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提出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等具体措施,预计每年可再为小微企业减负约2000亿元。

从此次会议可以看出,政府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不遗余力。在具体的减税措施制定方面,张俊伟认为,应该对中小企业实行依规模而梯度强化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即企业规模越小,适用税率也应该越低。另外,这种优惠性的税率结构应该是普惠性的,以减轻企业税收遵从成本;而不是只有经过政府认定的特定行业或特定企业才能享有上述政策优惠。

■ 谁受益

激发民企活力 助力稳增长

■ 本报记者 李海楠

2019年,减税降费继续成为大家高度关注的话题。缘起2018年年底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和重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1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

作为2019年开年的减税降费举措,此次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算是对“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的具体实践。各界舆论认为,减税降费将基于2018年基础上延续且凸显“更”字,表明减税降费规模将持续扩大。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市场激烈竞争,企业需要通过尽可能地减轻税费负担来降低成本、增强活力。其中,持续扩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正在激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活力上取得成效,从而助力经济平稳增长。

规模扩大对接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需求

减税降费一直被坊间形容为“刺激经济润滑剂”和“提振经济助力油”。这些比喻形象地揭示了其对经济稳增长的正向作用。通过梳理发现,我国近三年来的减税降费规模持续扩大。受访专家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决策层更加积极主动采取可措施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事实。持续扩大的减税降费规模背后,正是不断酝酿和发酵的经济下行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减税降费作为降低企业成本和激发活力的必要举措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重大责任。毕竟,只有切实提升了经济运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间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与升级,才能确保经济平稳可持续。

让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受益是关键

那么,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将让哪些人受益? 哪些人受益才能达到激发经济活力之目的也备受各界关注。

“显然,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以及创新型中小企业从减税降费中获取更多活力至关重要。”在王晋斌看来,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被列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内容的“三去一降一补”,始终肩负着维持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任,这一点决不可松懈。在此基础上,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等更具灵活性的企业活力才能被激发,继而助力新的产业集群式发展,同时促进统一大市场的高效运转,形成经济良性循环。

王晋斌认为,确保经济平稳向好,稳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是关键所在,这就需要不断改善包括营商环境、要素成本、投资回报等在内的制度环境。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有助于提升企业主观能动性,间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王晋斌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一系列减税降费等具体措施实现降成本。除了依靠具体的减税降费措施之外,另外类似于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降低负债率、简政放权改革等一系列举措都可以确保当前面对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的企业拥有合理的利润空间。

王晋斌强调,企业成本高导致民间企业投资意愿降低,盈利能力不足又难以实现创新转型,从这一角度看,减税降费带来的利好绝不仅仅限于成本降低,更对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作用。“通过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负债率等具体措施,确保企业应有的利润必不可少。”王晋斌表示,其中,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意味着减税降费“规模效应”也将更加突出,大可期待增强企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的成效显现。

■ 咋落实

深化税制改革 激发减税降费成效

■ 本报记者 童彤

1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其中不乏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小规模纳税人的直接免征举措,外界认为,这是对2019年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作出的进一步部署。

尽管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减税降费,且力度逐年加大,但从一线企业到学界均未减弱对继续推进减税降费力度的呼吁。2019年,政府已经明确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专家认为,这透露出政府决心克服影响减税降费成效的一系列挑战,以实现进一步激活企业活力的目的。

减税降费仍有较大可为空间

近年来,学界对于减税降费的政策目的,有着较为一致的公认观点,即认为减税降费意在通过以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经济发展动力的“乘法”。必须承认的是,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虽在逐步显现,但仍未改变其政策实施空间依旧较大的事实。

对于企业而言,除了税收和行政性费用之外,占据企业运营成本最大比例的莫过于社保缴费,由其直接导致的用工成本上涨正大幅度侵占企业利润,间接影响企业扩大规模以及创新转型。

“在营改增后,企业年缴税的确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政府办事效率也大幅提升,比如以前需要到窗口现场办理的业务改为网上办

理。”听闻记者询问有关减税降费对企业自身积极影响后,主营图书装订和包装业务的企业主赵女士对本报记者直言,但真正占到企业利润成本最高的实际上就是用工成本,“一方面是最最低工资标准连年上调,另一方面是缴纳社会保险的成本持续高位。”赵女士说,2019年新年伊始,为缩减用工成本,企业裁减了10名员工,只留下可以操作自动设备的员工,以对冲日渐上涨的用工成本。

实际上,对于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而言,用工成本高企一直是导致利润缩减的最大因素。仍以社保费率来看,尽管自2015年至今,我国已经实施五次对民营企业降低举措,“五险一金”占员工基本工资比例也已下浮10%至逾30%,但公认观点认为进一步下调空间仍在。

“裁员10名员工意味着原本用于支付的用工费用就可以转化为企业利润用于采购办公设备或者发放既有员工福利。”赵女士认为,作为小型民营企业,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之下,最先考虑的自然是裁减用工,除非政策层面有变化。

坚持税制改革 协同推进减税降费

谈及减税降费面临的阻碍,分税制财政体制带来的影响不得不提。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力锐减,财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广开财源,加剧了宏观税费负担;另一方面,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直接税比重过低,间接税比重过高,客观导致收入越低的企

业以及新创企业而言是不利的。

“防止地方财政收入出现枯竭是营改增以后我国税制改革继续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增值税已明确由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但对地方而言,少了原本属于地方税的营业税之后,确保地方财政收入仍是重点内容之一。

其中,发行地方债券正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可为之策,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也已箭在弦上。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同样是去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也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大对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负担。

可见,减税降费势必对财政收支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各方迫切期待寻求减税降费长效作用与平衡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长效做法,答案正在改革之上。蒋震认为,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思路是,要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负担,扩大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征收范围,寻求税制结构的优化。比如,增值税改革仍须进一步深化,在简并税率档次、解决进项税抵扣问题、缩小增值税优惠范围、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低税或者免税等方面进行改革。同时,对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等直接税同步实施改革,按照低税率、宽税基的原则来推动直接税改革,为增值税等流转税改革腾出空间。